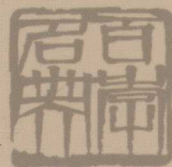




武汉大学
百年名典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

朱东润 著



根深葉茂 實亦聲滋
山高水長 流風長美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

朱东润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朱东润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 5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

ISBN 978-7-307-06878-0

I. 中… II. 朱… III. 文学批评史—中国 IV. I206.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1116 号
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授权出版

责任编辑:李 琼 责任校对:王 建 版式设计:支 笛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980 1/16 印张: 23.25 字数: 329 千字 插页: 4

版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06878-0/I·355 定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朱东润 (1896~1988)，著名传记文学家、文艺批评

家、文学史家、教育家、书法家。江苏泰兴人。早年留学英国，归国后曾任教于武汉大学、中央大学、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复旦大学。1929~1943年朱东润先生在武汉大学任教期间，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传记文学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52年起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生平著作超过1000万字，主要有《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张居正大传》、《中国文学批评论集》、《史记考索》、《汉书考索》、《后汉书考索》、《陆游研究》、《陆游选集》、《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左传选》、《杜甫述论》、《王阳明大传》、《陈子龙及其时代》、《元好问传》等。

出版前言

百年武汉大学，走过的是学术传承、学术发展和学术创新的辉煌路程；世纪珞珈山水，承沐的是学者大师们学术风范、学术精神和学术风格的润泽。在武汉大学发展的不同年代，一批批著名学者和学术大师在这里辛勤耕耘，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他们在学术上精品、上品纷呈，有的在继承传统中开创新论，有的集众家之说而独成一派，也有的学贯中西而独领风骚，还有的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而开学术学科先河。所有这些，构成了武汉大学百年学府最深厚、最深刻的学术底蕴。

武汉大学历年累积的学术精品、上品，不仅凸现了武汉大学“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学术风格和学术风范，而且也丰富了武汉大学“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学术气派和学术精神；不仅深刻反映了武汉大学有过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辉煌的学术成就，而且也从多方面映现了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成就。高等学府，自当以学者为敬，以学术为尊，以学风为重；自当在尊重不同学术成就中增进学术繁荣，在包容不同学术观点中提升学术品质。为此，我们纵览武汉大学百年学术源流，取其上品，掬其精华，结集出版，是为《武汉大学百年名典》。

“根深叶茂，实大声洪。山高水长，流风甚美。”这是董必武同志1963年11月为武汉大学校庆题写的诗句，长期以来为武汉大学师生传颂。我们以此诗句为《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的封面题词，实是希望武汉大学留存的那些泽被当时、惠及后人的学术精品、上品，能在现时代得到更为广泛的发扬和传承；实是希望《武汉大学百年名典》这一恢宏的出版工程，能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累和当代中国学术的繁荣有所建树。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编审委员会

出版说明

1929—1942 年朱东润先生执教武汉大学期间，写成《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并曾以此书为讲义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1944 年，《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由开明书店出版。1981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现根据此版本，将《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列入《武汉大学百年名典》重新出版，以资纪念。此次出版，在力图保留原貌的基础上，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按现行标准对标点符号进行了适当调整，对明显的文字讹误进行了订正。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10 月

自序

一九三一年，我在国立武汉大学授中国文学批评史，次年夏间，写成《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初稿。一九三二年秋间，重加订补，一九三三年完成第二稿。一九三六年再行删正，经过一年的时间，完成第三稿。一九三七年的秋天开始排印。这时对外的抗战爆发了，烽火照遍了全国，一切的机构发生障碍，第三稿印成一半，只得搁下，其余的原稿保存在汉口。一九三八年春间，武汉大学西迁。就在这一年，放弃武汉，整个的战局起了变化。这部《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第三稿也只剩了上半部。

在这几年的中间，自己曾经几次想把这部书重行写定，但是手边的书没有了，手抄的笔记也没有了，连带想把第二稿的下半部重行删正，也不可得。承朋友们的好意，要我把这部书出版，我总是迟疑。我想待第三稿的下半部收回以后，全部付印，因此又迁延了若干时日。事实终于显然了，我的大部的书籍和手写的稿件都没有收回的希望。所以最后决定把第三稿的上半部和第二稿的下半部并合，略加校定，这便是这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的前身。在这里，一切的形式和内容，无疑地都流露了讲义的气息。

讲义便有讲义的特点。因为授课的时间受到限制，所以每次的讲授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因为讲授的当中不能照本宣读，所以讲授的材料不能完全搁入讲义。因为在言论中要引起必要的注意，同时因为引证的语句，不能在口头完全传达；所以讲义中间势必填塞了许多的引证，而重要的结论有时不尽写出。因为书名人名的目录，无论如何的重要，都容易引起听众的厌倦；所以除了最关紧要的批评家和著作以外，一概不轻阑入。这些都是讲义的特点，姑不必问其是优点或

是缺点。

然而讲义确有讲义的缺点。因为要避免掉书袋的批评，所以引书不一定注明篇卷。因为校对的疏忽，所以字句的误植，标点的错排，有时多至惊人。这里的责任，有些属于我自己，也有些不属于我。在出版的时候，当然应该全部改定，责无旁贷。在平时，本来应当如此的，然而现在是战时。战争增加了无限的光荣，然而也发生了不少的困难。战时的书肆，贫乏到怎样的程度，战时的图书馆，凌乱到怎样的程度，在太平了以后，大家也许不易想象，但是身经战时的我们，正在抗战的当中，必然会加以体认。我相信宽恕的读者对于这本书的疏忽，也许会加以格外的优容。我也希望还有书籍凑手，重新写定的一日。然而我对于这本书的疏忽，只有负责，只有引咎。

在我的初稿写成以前，陈钟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已经出版了；在初稿完成以后，郭绍虞先生的和罗根泽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也陆续出版。此外还看到许多关于中国文学批评的著作。诸位先生治学的热忱和撰述的价值，深刻地引起我的钦服。但是我对于我这本书的责任，一切由我自己负担。在和诸位先生的著作显然相同的地方，我不曾作有心的抄袭；在和诸位先生的著作显然不同的地方，我也不曾作故意的违反。讨论一切事物的时候，有一般的局势，有各殊的立场。因为局势相同，所以结论类似，同时也因为立场不一，所以对于万事万物看出种种不同的形态。这本书的内容，和诸位先生的著作有异同的地方，只是事理的当然，原不足怪。我需要特别指出的，就是不同的地方只是看法的不同，不敢抱自是的见地。

第一个不同的地方，是这本书的章目里只见到无数的个人，没有指出这是怎样的一个时代，或者这是怎样的一个宗派。写文学史或文学批评史的人，忘去了作者的时代或宗派，是一种不能辩护的疏忽。在全书中，我曾经指出刘勰、钟嵘所处的时代，我也曾指出对于当时的潮流刘勰如何地顺应，钟嵘如何地反抗。我曾经指出元祐以后江西派几度的革新，我也曾指出反江西派的批评者如何地奋斗。至于明代秦汉派和唐宋派的递兴，清代神韵、性灵两宗的迭起，桐城、阳湖两派的相关，我相信我也曾经指出。但是我不曾对于每个时代加以特殊

的标帜，而对于每个批评家，纵使大众指为某宗某派，甚至自己也承认是某宗某派，我很难得在姓名之上加以特别的名称。一切都是出于有意。我认为伟大的批评家不一定属于任何的时代和宗派。他们受时代的支配，同时他们也超越时代。这是一个矛盾，然而人生本来是矛盾的。刘勰承受宋齐以来的潮流，然而刘勰不满意宋齐以来的现实。严羽承受南宋以来的潮流，然而严羽不满意南宋以来的现实。假如我们承认刘勰、严羽的超越时代只是一种特例罢，但是钟嵘较之刘勰更加超越，方回较之严羽也何尝不超越？我们怎样解释呢？就宗派而论，伟大的批评家也和伟大的政治家一样，他们的抱负往往是指导宗派而不受宗派的指导。宗派会有固定的规律，甚至也会有因袭的恩怨，然而伟大的人生常会打破这些不必要的规律和不可理喻的恩怨。韩愈和李翱不同，黄庭坚、陈无己和韩驹、吕本中不同，李攀龙和王世贞不同，方苞、刘大槩和姚鼐、曾国藩不同，我们又怎样解释呢？也许有人指出他们之间大同小异，所以不妨承认宗派的存在。倘使他们的中间只是大同小异，原不妨这样说；但是谁能保证他们的中间不会是小同大异呢？因此，在这些情形之下，就时代或宗派立论，有时固然增加了不少的便利，有时也不免平添了若干的困难。所以，我决然放弃时代和宗派的标题，在章目里只见到无数的个人。这是一个尝试，也许可以得到读者的容许。

第二个不同的地方，是对于每个批评家，常把论诗论文的主张放在一篇以内而不给以分别的叙述。批评家论诗论文，有时采取不同的立场：韩愈是一个例，袁枚自称论文严而论诗宽，更是显然的一个例。所以分门别类的叙述，确实有一种便利；但是这里，和上面一样，也有相当的困难。苏轼论诗论文论词，都有他的主张，我们不便把整个的苏轼分隶于三个不同的篇幅。在一部比较详密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里，困难还要增加。刘熙载的《艺概》，论诗，论文，论赋，论词曲，论经艺，我们更不便把整个的刘熙载分隶于五六个不同的篇幅。中国文学批评史究竟不是文论史，诗论史，词曲论史的联合的组织，所以我决意放弃分门别类的叙述；除了仅有的例外，在这本书里所看到的，常常是整个的批评家，而不是每个批评家的多方面的

组合。

第三个不同的地方，是这本书的叙述特别注重近代的批评家。中国是一个富于古代历史的国家，整个的知识界弥漫了“信而好古”的气氛。五四运动以前，一般的知识分子固然是好古；五四运动以后，除了打开窗户，吸收一些外来的空气以外，仍然是好古。大学课程里，文学史的讲授，只到唐宋为止；专书的研讨，看不到宋代以后的作品——并不是罕见的实例。因此即是讨论到中国文学批评，一般人只能想起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最多只到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十一世纪以后的著作，几乎逸出文学界的视野，这不能不算是骇人听闻！有人会说文学批评的原理，刘勰、钟嵘已经说尽，其余只剩一些枝叶，用不着过分注意。在言论自由的社会里，每人有发表意见的自由，这当然是一种意见。但是我的意见，是应当根据远略近详的原则，对于近代的批评家加以详密的叙述。也许这里讲得太多一点，但是我们对于一千年以来的历史既然无法加以“革除”，我们的生活同样地也无法超越近代的阶段，遥接一千年以上的古人，那么即使多知道一点近代文学批评的趋势，似乎也不算精力的浪费。何况纵使这本书“远略近详”，其他主张“远详近略”的著作原自不乏。一切的事物，相反亦可相成，广博的读者当然可以得到必要的补偿。

这本书的出版虽迟，但是看见讲稿的人已经不少。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来的批评，我是一概地接受，一概地感激。除了几种极端的评论以外，这里可以提出一点。有人说这本书虽然是“史”，但是还有些“文”的意味。有人说这是“文学批评之批评”。假如我的猜测不错，他们的意见也同样地认为这本书不完全是史实的叙述，而有时不免加以主观的判断。这一点我当然承认，但是我愿意声明，一切史的叙述里，纵使尽力排除主观的判断，事实上还是不能排除净尽。“大学之道，在止于至善。”什么是“至”？《中庸》说过，君子之道，“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我们的目标，不妨完全是史实的叙述，然而事实上不能办到，这是一点。还有，既然是史，便有史观的问题。作史的人总有他自己

的立场，他的立场所看到的，永远是事态的片面，而不是事态的全面。固然，我们也说要从许多不同的角度，观察事态，但是一个事态的许多片面的总和，仍旧不是事态的全面。这是又一点。还有，历史的记载当然是史，文学批评史也是史，但是和历史的史究竟还有些许的不同。在以往的许多著作里，什么是文学批评，什么不是文学批评呢？在取材的时候，不能不有一个择别，择别便是判断，便不完全是史实的叙述。在叙述几个批评家的时候，不能不指出流变，甚至也不能不加以比较，这也是判断，更不是史实的叙述。文学批评史的本质，不免带着一些批评的气息。这是第三点。事态上无可避免的现实，只有请求读者的原谅。

这本简陋的著述在国难中付印，更减少了请求订正和自行修改的机会。叙述的错误和判断的不正确，都在所不免，一切请求读者不吝指示，俾得订正。

在本书的创始和出版中，得到许多朋友的指导，我都十分感激。对于协同搜集材料的任慧忱先生，提议付印的马文珍先生，和赞助出版的叶圣陶先生，尤其应当借此机会，表示深切的感谢。

一九四三年二月，重庆，柏溪

目 录

第 一	绪言	1
第 二	孔子孟子荀子及其他诸家	3
第 三	《诗》三百五篇及《诗序》	8
第 四	西汉之文学批评	13
第 五	东汉之文学批评	16
第 六	建安时代之文学批评	22
第 七	陆机 陆云	25
第 八	皇甫谧 左思 挚虞 附李充	29
第 九	葛洪	32
第 十	范晔 萧子显 附裴子野	36
第十一	沈约	40
第十二	刘勰	45
第十三	钟嵘	55
第十四	萧统 萧纲 萧绎	62
第十五	颜之推	67
第十六	隋代之文学批评及“文中子”	72
第十七	唐初史家之文学批评	75
第十八	刘知幾	78
第十九	初唐及盛唐时代之诗论	83
第二十	白居易 元稹	87
第二十一	韩愈	90
第二十二	柳冕 柳宗元 李翱 皇甫湜 李德裕	94
第二十三	司空图 附唐人论诗杂著	101

第二十四	欧阳修 曾巩	105
第二十五	王安石 蔡绦 叶梦得	110
第二十六	苏轼 苏辙 张耒	115
第二十七	黄庭坚	122
第二十八	陈师道 范温	127
第二十九	吕本中 韩驹	133
第三十	张戒	138
第三十一	杨万里 姜夔 陆游	143
第三十二	叶适	150
第三十三	朱熹 附道学家文论	153
第三十四	自《诗本义》至《诗集传》	160
第三十五	严羽	164
第三十六	刘克庄	169
第三十七	晁补之 李清照 黄昇	173
第三十八	沈义父 张炎	177
第三十九	方回	181
第四十	元好问	186
第四十一	贯云石 周德清 乔吉	190
第四十二	高棅	193
第四十三	李梦阳 何景明 徐祯卿 附李东阳	199
第四十四	杨慎	204
第四十五	谢榛 王世贞	209
第四十六	唐顺之 茅坤	216
第四十七	归有光及“弇州晚年定论”	220
第四十八	徐渭 臧懋循 沈德符	224
第四十九	吕天成 王骥德	229
第五十	袁宏道	234
第五十一	钟惺 谭元春	238
第五十二	钱谦益	243
第五十三	冯班	248

第五十四	陈子龙 吴伟业	252
第五十五	黄宗羲	257
第五十六	王夫之 顾炎武	262
第五十七	侯方域 魏禧	267
第五十八	毛奇龄 朱彝尊	272
第五十九	王士禛	276
第六十	吴乔 赵执信	282
第六十一	叶燮	287
第六十二	清初论词诸家	292
第六十三	金人瑞	298
第六十四	李渔	302
第六十五	方苞 刘大槐	306
第六十六	姚鼐 刘开	310
第六十七	纪昀	314
第六十八	沈德潜	318
第六十九	袁枚	321
第七十	赵翼	326
第七十一	章学诚	331
第七十二	阮元	335
第七十三	恽敬	338
第七十四	张惠言 周济	341
第七十五	曾国藩	346
第七十六	陈廷焯	350
后 记		355
再版后记		356

第一 绪 言

文学批评一语，古无定名。《隋书·经籍志》于《文章流别志论》、《翰林论》、《文心雕龙》等诸书，皆附列总集之后，所谓解释评论，总于此编者也。旧《唐书》因之。新《唐书·艺文志》始立文史类，凡四家四部十八卷，其不著录者又若干。《宋史》因之，凡九十八部六百卷，然如《艇斋诗话》、《苕溪渔隐丛话》等，又别人小说类，则分部别居，盖有未尽者。《明史·艺文志》亦有文史类，凡四十八部二百六十卷，其错入小说类者未见，盖视《宋史》为加谨矣。《四库总目》始别有诗文评类，然亦不能尽赅文学批评，如《乐府指迷》，《词苑丛谈》之附入词曲类者是也。

凡一民族之文学，经过一发扬光大之时代者，其初往往有主持风会，发踪指使之人物，其终复恒有折中群言，论列得失之论师，中间参伍错综，辨析疑难之作家，又不绝于途。凡此诸家之作，皆所谓文学批评也。得其著而读之，一代文学之流变，了然于心目间矣。

文学批评与批评文学，二名并悬，诂训两异。文学批评之义，略如前陈，批评文学则指其中之尤雅饬整齐者而言。只词单句，不成片段者，固无论矣，即摭拾剩语，勉成完书者，亦非其伦。举此以绳，自《文心雕龙》，钟嵘《诗品》，《史通》，《原诗》，《文史通义》诸书以外，可得而数者，盖无几矣。今兹所论，固不限此。

或者谓文学批评之盛衰，每视文学之升降为转移，斯又不然。魏晋六朝之文学，以太康间为极盛，而刘钟成书，翻在齐梁。唐人之诗，标新领异，恢广疆土，包毓灵异，而唐人论诗，自司空图《诗品》以外，未中肯綮。妙观逸响之句，独标奥义，诗眼响字之论，备言音律，此皆出自宋人，远迈唐代。宋人之词，千年独擅，然宋人

论词，或造诗余之说，辞而辟之，翻在近日。至于东坡之空灵，碧山之沈郁，推少游为词心，辟刘蒋为外道，此论惟于后人得之。戏曲肇自金元，小说盛于明代，而评论戏曲，批判小说，则探幽钩深，出色当行者，盖犹有待。然则，谓文学批评之与文学同时升降者，误矣。

然于此中有当知者，则对于某项文学之批评，其成熟之时，必在其对象已经完成以后。有违此例，必多乖舛。昔挚虞持论，谓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至于五言七言，但于俳谐倡乐用之。此言若令六朝以后闻之，宁不成为笑柄。英人高斯尝言：“自今观之，昔日之批评家建树规律，执一绳万，其病常在所不免，正规之批评中，常为此规律太严之病所乘，而创造的形象所成之作品，常以不合当代之规律而见斥，如勃莱克、基慈，乃至弥尔敦之诗是矣。”此言可以证也。

至于中国文学批评之分类，《四库总目·诗文评类》提要云：“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于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总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棻《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举此五端以当文学批评，范围较狭，而诗话词话杂陈琐事者，尤非文学批评之正轨。然前代文人评论之作，每每散见，爬罗剔抉，始得其论点所在，正不可以诗文评之类尽之也。至若东坡之论苏李赠答，晦庵之辨《诗》大、小序，此则自为考订一派，逸出文学批评之常轨，今兹所述，盖从略焉。

今欲观古人文学批评之所成就，要而论之，盖有六端。自成一书，条理毕具，如刘勰、钟嵘之书，一也。发为篇章，散见本集，如韩愈论文论诗诸篇，二也。甄采诸家，定为选本，后人从此去取，窥其意旨，如殷璠之《河岳英灵集》，高仲武之《中兴间气集》，三也。亦有选家，间附评注，虽繁简异趣，语或不一，而望表知里，情态毕具，如方回之《瀛奎律髓》，张惠言之《词选》，四也。他若宗旨有在，而语不尽传，照乘之光，自他有耀：其见于他人专书，如山谷之

说，备见诗眼者为五；见于他人诗文，如四灵之论，见于《水心集》者，六也。此六端外，或有可举，盖不数数觐焉。

读中国文学批评，尤有当注意者，昔人用语，往往参互，言者既异，人心亦变。同一言文也，或则以为先王之遗文，或则以为事出沉思，功归翰藻之著作。同一言气也，而曹丕之说，不同于萧绎，韩愈之说，不同于柳冕。乃至论及具体名词，亦复人各一说，如晚唐之称，或则以为上包韩柳元白，或则以为专指开成而后。逐步换形，所指顿异，自非博综于始终之变者，鲜不为所瞽乱，此则分析比较，疏通证明之功之所以贵也。

第二 孔子孟子荀子及其他诸家

文学者，民族精神之所寄也。凡一民族形成之时期，其哲人巨子之言论风采，往往影响于其民族精神，流风余韵，亘千百年。故于此时期中，能深求一代名哲之主张，于其民族文学之得失，思过半矣。此其人虽不必以文学批评家论，而其影响之大，往往过一般之批评家远甚。

《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旧说以为虞舜之言，说《诗》者多称道之，所托虽古，实不足信。求古人之言论，要不出春秋以来，其时实为吾民族形成之时代。自周之兴，宗族勋旧，分布东方，及犬戎进逼，幽王失国，于是全民族东徙，复与东方固有之诸族混合，文化进展。今日吾人所读之古籍，《诗》《书》《春秋》，皆此时期以来之产物也。其时之思想家，与后代以最大之影响者，则有孔子。

孔子论文，皆指学问而言，与后世之言文学者不同。《论语·雍也》：“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其意可见。他如《论语》所记，皆可举证：